

政大在羊城

吳自甦

寄讀羊城政大一月記

三十八年春三月，我叩別慈母，含淚離京。

在兵荒馬亂的七月仲夏，輾轉到了政府所在地——廣州。隨即和幾位失散而重聚的中大學友，投考播遷在穗的政治大學。考畢臨時因事去來陽（詩聖杜甫客死此鄉，尚存有杜之衣冠塚），三數日後又再擠粵漢路火車趕回來看榜，僥倖名列前茅，三四百人考，一共取了十來名，也算不容易（政大在羊城招寄讀生三次，此為最後一次）之後，我和世旭、曉曙、樹松（已故）諸兄一同去拜見楊代校長希震，在一間旅社的樓上，談話時才知他戰前曾在南京中大肄業，我們對之就益顯親切敬愛。

八月初，接通知逕往大滙墟報到，我等四人提着簡陋的行囊，由廣州大沙頭渡珠江到石圍塘車站，搭往南海線的汽車（另有火車），約半小時抵大滙，費了幾番口舌，才問到政大的所「住」地——李氏書院（可能是李家的祠堂），辦了一些簡單的手續，我們就開始過寄讀的生活。

一宿無話，次日從事了解環境，學校既在鄉下（墟即村落、市場趕集之意），一反廣州市的繁雜，幾條古老的街道，附有一家獨立小型茶樓，我們好奇走進觀看，竟發現樓下不但有幾檯輪盤賭，還有幾間吸鴉片的雅室，堂而皇之，公開

營業，令人不可思議，再經打聽，此時廣東若干地區，似已「無法無天」矣！旋獲幾位政大學長警告，千萬不要離校太遠，或隨便進入民衆、農舍，以免發生意外（言語不通，尤易誤會），這就使我等爲之警惕，大有入境問俗，身在異邦之感。

由於正值暑假，我們雖獲入校，還談不上開學，但往後究竟在何處上課，却在未定之天。因爲遷校的問題迄未解決也。原來政大這一羣三百名忠貞的師生，是南京、甚而是全國，唯一的一所大學，隨政府播遷到南國的。（謹按我中央大學愛國師生原擬先遷校到福建，因此江良規教授已先行勘察，唯事後受阻），他們希望在緊急時集體去台灣或回南溫泉復校（此時廣州已現不穩），然而受台灣入境所限，（風聞當時的政策，寶島不允有第二間大學），楊代校長三番兩次交涉，并隨教育部抗立武部長來台，又會到台中求援黨國元老、政大保姆陳果夫先生，可是仍不得要領，同學們期待之情殷切，焦慮、徬徨亦苦不堪言。

記憶中每三兩天晚飯後就開系級代表大會，討論遷校大計，代校長偶爾從省城趕來參加，希望不絕如縷。我是寄讀的身份，不便參與多話，常作壁上觀——實際是在床上，因爲會場就是宿

舍、飯廳三合一——心裏自然也跟着乾着急。

儘管白天閒着無聊，但比無校可寄，總略勝一籌。飽餐之餘，看書、讀報，印象較深的是張其昀先生著「中國的前途」一、二兩冊，論及陸權、海權、空權時代，和在香港創刊不久的「民主評論」，其中唐君毅先生（中大哲學老師）、徐復觀、錢穆先生的文章，份量最重，而沙學浚先生（地理學教授、中大訓導長）一篇題名「抗戰靠山·戡亂靠水」的專論（刊在上海出版的某雜誌），更引起我對台灣的興趣和嚮往，那些悶悶的時日，午後間或跟學長們到距書院不遠的小池塘游水。苦中作樂，也滿有興味。而回念勝利後再度流亡生涯，轉瞬半年矣。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能無感慨乎？最後學校扼於情勢，不得不決定諸生月底分批入川，我和旭兄等由於學棋不定，竟因臨時卜課，而未與大夥登船經梧州轉道重慶，就在次（九月）月初得一機緣，搭乘華聯輪渡海，隨即分別在台完成學業，人生際遇，冥冥中似有天意。今日政大終於在木柵復校，較南京、重慶時代更具規模，（中央大學亦在台灣中壢重建）這又豈非事在人爲乎？我一直未敢以政大校友自居，惟有大滙墟那段寄讀的日子，依稀值得一記！（六三年歲末於台中）